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比喻

保持清正廉洁的安全防护栏

党的纪律是党员干部

□王懂棋

202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时指出，党的纪律为正确行使权力、防止以权谋私划出了底线、设置了禁区，是党员、干部保持清正廉洁的安全防护栏。敬畏纪律、遵守纪律，就能抵御腐蚀、百毒难侵。

安全防护栏本义指用竹、木、铁条等做成的起警示、隔离、保护作用的阻拦物。习近平总书记用安全防护栏比喻党的纪律，生动形象地指明了党的纪律为党员干部行使权力廓清了边界，强调严守纪律对党员干部廉洁从政、干净干事的重要性。

正如安全防护栏能够隔离危险，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规范着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行为，为正确行使权力、防止以权谋私划出了底线、设置了

禁区。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在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都要贯彻严的要求，不以权势大而破规，不以问题小而姑息。百毒难侵方能担当作为，通过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时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让党员干部时刻对权力保持敬畏之心，做到慎独慎初慎微，更好地干净干事、大胆干事。

中国共产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正如要确保安全防护栏能持久发挥作用需经常检修，党的纪律规定也要根据形势和党的建设需要不断完善，防止脱离实际、滞后于实践。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强调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本着于法周延、于事有效的原则，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扎紧党纪党规的笼子。通过制定修订《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不断提升法规制度整体效应，使实体性法规制度和程序性法规制度、综合性规定和专门性规定、下位法规制度和上位法规制度相互协调、相辅相成。注重体现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的要求，突出党纪特色。一个以党章为根本、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已经成形，保证纪律的“安全防护栏”时时有效。

严管就是厚爱。安全防护栏设置的目的是保护人们的安全，党的纪律不仅体现严管，更体现厚爱，不仅规范履职行为，而且激励担当作为，为干事创业提供广阔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教育培养一名领导干部不容易，一旦在廉政方面出了问题，党组织多年的培养和本人以前的一切努力就毁于一旦。各级党组织一定要负起责任，敦促教育干部廉洁自律，不能放弃责任”。对干部身上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早提醒、早纠正。针对现实情况的复杂性，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执纪中要坚持“三个区分开来”，做到激励和约束并重，更好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运用“四种形态”提供的政策策略，通过有效处置化解存量、强化监督遏制增量，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在党纪的监督执行上，要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领导干部要抓好分管领域或主政地方的党风廉政建设，坚决同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作斗争，纵深推进铲除“围猎”这个政治生态污染源；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加强对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管理，以家风带社风、树新风，推动激励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持续向好。实践证明，纪律是党员干部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和遵循，是党的生命线。只有通过深入的纪律教育和严格执纪，才能把党章党规党纪真正刻印在广大党员干部的心上，让党员干部在“安全防护栏”内放心干事、积极作为。

经常反对官僚主义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重温周恩来《反对官僚主义》

□徐行

重读经典

1984年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恩来的文章《反对官僚主义》。这是周恩来1963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关于反对官僚主义部分的要点，后来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文献深刻批判了官僚主义的各种表现，剖析了其根源和危害。重温这篇文献，对我们新的形势下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官僚主义的表现形式

周恩来认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一定要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在《反对官僚主义》中，周恩来对官僚主义的表现、危害作了全面的分析和论述。

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其表现形式是“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周恩来严肃批评说，党的路线、政策再好，如果执行的业务部门给阻塞住了，那就是把党和群众隔开了。这种官僚主义是领导者尤其是高级领导者必须时时警惕的。

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其表现形式是“狂妄自大，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粗枝大叶；不抓业务，空谈政治；不听人言，蛮横专断；不顾实际，胡乱指挥”。周恩来明确指出这种官僚主义的危害在于：“一个人站在领导地位，不虚心、不平易近人，自以为了不起、什么都懂，只要有这种思想并且在作风中表现出来，就危险了。”这种人总是“蛮横专断，瞎乱指挥。”

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周恩来指出其表现是“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对事情没有调查，对人员没有考察；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既不研究政策，又不依靠群众，盲目单干，不辨方

向”。针对这种貌似无大害的官僚主义，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常有人说：‘我做个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好像这种官僚主义还能容许似的。我看，这种官僚主义也要批判。”“如果是个领导干部，怎么能容许他是个事务主义者呢？”

特殊化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人“图享受，怕艰苦；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请客送礼，置装添私；苦乐不均，内外不一”。周恩来严肃地指出，“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如果图享受，怕艰苦，甚至走后门，特殊化，那是会引起群众公愤的”。

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其表现形式是“革命意志衰退，政治生活蜕化；靠老资格，摆官架子；大吃大喝，好逸恶劳，游山玩水，走马观花；既不用脑，也不动手；不注意国家利益，不关心群众生活”。周恩来认为，“官僚主义发展到这个程度，就严重得很了。一个干部、一个共产党员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有革命的热情，要有朝气、有干劲。革命热情一衰退，政治上就要蜕化了”。

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患有这种官僚主义的干部已经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周恩来尖锐地指出，他们“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直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作奸犯科，害党害国”。这是我们党纪国法所不容许的。

除此之外，周恩来还列举了老爷式的官僚主义、不老实的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颟顸无能的官僚主义、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懒汉式的官僚主义、机关式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宗派性的官僚主义等共计20种官僚主义，并对其表现形式作了深入分析和严厉批判。

官僚主义的根源和危害性

周恩来不但列举了官僚主义的

种种表现，还深刻分析了官僚主义的社会根源。他指出，官僚主义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长期封建统治的遗产，“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反对官僚主义，也就必须联系到反对这些主义”。在工作中，周恩来深深感到“官僚主义在我们执政的党内，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

官僚主义不但危害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也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它可能导致党的干部由人民公仆变为社会蛀虫，使人民群众失去对党和国家干部的信任。周恩来常告诫党的干部，要把党和国家建设好，就必须“经常反对官僚主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引发重大失误，造成重大损失。周恩来充分认识到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他深知由于中国复杂的社会和历史原因，“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一百年来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官僚主义更是有深远的影响”。因此它是不可能一下子就彻底消灭掉的，这是一场持久战，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与官僚主义展开斗争。

周恩来意识到，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中，有严重官僚主义作风的虽然只是少数，但已经给我们的工作造成许多损失，如果任其发展，不坚决制止必将给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带来更大的危害。因此，“我们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

为整治官僚主义提供宝贵精神财富

周恩来提出的反对官僚主义的主张不但在当时对党员干部起到了教育警示作用，而且在新的形势下更启示我们要继续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and 反腐败斗争。

首先，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增强党员干部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把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协助职责统筹起来，把监督体系与治理

体系贯通起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纠正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和不正之风。党员干部要学习周恩来，时时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以身作则，严格自律。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不断增强斗争本领和驾驭改革风险的能力，杜绝“为官不为”的现象。

其次，构建全方位权力运行监督格局，强化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良性互动，党员干部自觉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批评。不断完善党内监督各项制度，深化落实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任务，持续推动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贯通衔接。切实保证民众知情权和参与权，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群众监督和媒体监督的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每个党员都应对照《反对官僚主义》中批判的官僚主义表现，检查自己是否也有类似的错误行为，检视自身存在的问题。

最后，激发党员干部敢作敢为、善作善为的内生动力，探寻杜绝官僚主义的新举措。加强思想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权力观。教育党员干部认真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培育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价值取向。严格要求各级干部秉公用权、依法用权，把勤劳敬业、一心为民内化为自律准则和思想自觉。同时，数字化时代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新要求。未来要将数字技术发生的变革和反对官僚主义的举措相结合，与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相融合，探索纠治“四风”新举措，运用数字技术驱动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机制创新和防止官僚主义的路径优化，彻底根除官僚主义滋生的环境和土壤。

作风建设关系到人心向背，关系到执政党的兴衰成败。《反对官僚主义》一文，寓意深远，为我们今天继续大力整治官僚主义提供了宝贵精神财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我们向周恩来同志学习，牢记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自觉接受监督，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拒腐蚀、永不沾，决不搞特权，决不以权谋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人”。

1922年，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中国问题》中提出了有关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展望。仔细阅读罗素的表述可以发现，这个展望中的关键词是“学习”。在很大程度上，罗素把学习当作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当作他对中国乐观期待的重要依据。

“给整个人类以新的希望”

伯特兰·罗素于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在华讲学，回国后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在书中，罗素对中国作出了一个预测——“中国以其资源和人口完全能成为美国之后的世界最强国家”。同时，罗素也提出了一个西方人难免会有的担心——“在为足以维护独立而增强国力的过程中，中国会不会使国力大到足以开始帝国主义的营生”。在此基础上，罗素表达了对中国未来的展望：“如果中国的改革者增强国力只是为了足以自卫而非进一步征服异族；如果一旦国内太平洋他们就搁置被列强拖入的富强追求，而放开手脚去发展科学艺术，并开启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中国对世界可谓发挥了最适合她来发挥的作用，并且在这个最没有希望的时代，给整个人类以新的希望。”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中国问题》会发现，罗素对中国未来的这种展望，与他在书中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观点，有密切联系。他提到：“在现今的中国，我们的文明与这个天朝帝国的本土文明之间，发生着密切的接触。这种接触的结果是什么，是培育



“只有中国人最了解自己”

——读[英]伯特兰·罗素《中国问题》

□童世骏

出现一种比其双亲都更优秀的新文明呢，还是干脆将本土文明摧毁并由美国文明取而代之，这一点尚在未定之中。”在过去，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一个个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学习希腊。阿拉伯人学习罗马帝国，中世纪欧洲学习阿拉伯人，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学习拜占庭人。许多此类个案中，学生被证明是比老师更优秀的。就中国而言，如果我们把中国人当作学生，可能又会是这样的情况。”

在这段人类文明发展叙事中，关键词是“学习”。关于学习，从古到今各个领域都可以找到许多重要论述；相比之下，当代心理学家的一个研究，也很值得重视。例如，有学者指出，人类独有的认知技能最初的凸显，是随着智人的出现才发生的。如此短时间内发生那么大的进化，关键因素是人类特有的借助于语言而进行的“文化学习”。与最近几年来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相伴随，“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这些概念也频繁出现在生活当中。正如今年年初以来我国的科

研团队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程序告诉我们的，机器学习领域的不断进步，只是人类学习在超出动物学习以后实现自我超越的一种最新形式。说到底，人类的学习能力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关键因素。

“他们渴望的不是征服”

罗素是一位顽强的和平主义战士，他一方面对中国人民用武力反抗强权、抵御侵略充满同情，另一方面又对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传统极为敬重。在他看来，中国人的天然态度就是宽容和友善的——对别人以礼相待，并期待对方以善意回报。他甚至说，中国人只要愿意，他们是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民族的；然而他们所渴望的只是自由，而不是征服。但罗素也担心，恰恰是为了在近代以来力图征服自己的列强面前捍卫自己的独立和自由，中国人不得不向列强学习现代科学技术、采纳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其结果很可能是这个和平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家变得像欺侮她的列强一

样称王称霸。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说，中国就“名胜而实败了”。

早在1920年，毛泽东就听过罗素的演讲，并与其新民学会同道对罗素观点进行深入思考。罗素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5年12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谈到形式逻辑时，还提到罗素，说罗素送他一本小册子，可以翻译出来。在很大程度上，当毛泽东宣告新中国成立并强调“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时，当毛泽东在预言21世纪中国将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同时告诫“要谦虚”，并且在国际交往方面“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时，就证明了中国的发展对他国、对世界决不是挑战和威胁，中国决不会称霸。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为国际社会的和平和发展付出越来越多的努力，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

者，更说明了罗素的担心是多余的。

罗素对于中国未来的展望，不仅与他把“学习”当作人类文明发展最值得重视的力量这一观点相联系，而且可以从中华民族自己有关学习的智慧传统那里得到最重要的支持。中华民族不仅主张以和为贵、和而不同，而且高度重视学习——不仅愿意学习，而且善于学习。《论语》首句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孔子看来，只有配上了“好学”这个“元德目”，其他德目（仁、智、信、和、勇、刚）才不会走样甚至变质。在孟子看来，虽然好学的弟子越多越好，但“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为师者也不能只知教而不愿学。根据《礼记》所述“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不请而来的“教”，强人所难的“学”，都是有违《大学》所谓“絮矩之道”的。

“想得更多的是我能从他们那里学到什么”

中国古代的“好学”传统在现代

中国得到了很好的传承，罗素对此也有敏锐觉察：“我毫不怀疑，如果能有稳定的政府和充足的经费，中国人在下一个三十年中将开始创造可观的科学成就。中国人超出我们是很有可能的，因为他们是带着新鲜热情出场的，他们身上焕发着新潮气息。事实上，少年中国派的学习热情，不断地让人想起十五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精神。”

不知道是否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罗素意识到，哪怕承认学生经常被证明是比老师更优秀的，他作为西方人说中国是自己的学生，总不太妥当。所以，他在之前那段话之后赶紧补充说：“事实上，我们（西方人）要向他们（中国人）学习的东西，一点也不少于他们要向我们学习的东西，但我们学习的机会却少得多。如果我把中国人当成我们的学生，而不是相反的话，那也只是因为我担心我们并非可教之才。”罗素感慨：“当我去中国时，我是去教的；但在那里的每一天，我想得更多的是我能教他们什么，而想得更多的是我能从他们那里学到什么。”

正是出于这样的态度，罗素在《中国问题》中写道，“只有中国人最了解自己”，“只有他们自己慢慢摸索出的解决办法才是长久之计”。这句曾被习近平主席在英国演讲时引用过的话，清晰地表达了罗素对善学好学的中华民族的乐观期待和坚定信心。

从外国人著作看中国